



河北省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HEBEISHENG TONGYI ZHANXIAN XILIE CONGSHU

理论园

中国政党制度 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树臣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王树臣 1969年11月生，河北阜城人，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副主任、教授，全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理事，河北统一战线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统战及政党理论等领域研究，先后主持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河北省基金项目等十余项，发表《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逻辑支点、辩证关系和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等八十余篇论文。

中国政党制度 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树臣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 / 王树臣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9
(河北省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河北统战理论园)
ISBN 978-7-202-10873-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261 号

丛 书 名 河北省统一战线系列丛书·河北统战理论园
书 名 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
作 者 王树臣

责任编辑 欧阳红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10873 - 4/C · 317

定 价 2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一战线面临着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新任务。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晰与深厚。要把新时期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好，把统战工作进一步开展好，必须率先在理论上创新突破，与时俱进，一方面对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对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指引和诠释，用统战理论创新推动统战工作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河北是统战资源大省，有着丰富而深厚的统战文化积淀，承载着我们党统战事业的光荣传统。张家口涿鹿三祖堂是中华同根文化的历史见证，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群是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文化的物化结晶；革命圣地西柏坡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发祥地，平山县李家庄是中央统战部的诞生地，阜平县城南庄是“五一口号”的发出地，新政协和新中国统一战线从这里走来；正定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重视支持并亲自做统战工作的生动实践和感人事迹。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挖掘利用好河北丰富深厚的统战文化资源，传承发扬河北统战的优良传统，积极推动统战工作理

论和实践创新，是河北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为此，我们顺应统一战线发展的时代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促进，组织力量深入挖掘河北统战文化资源，加强统战理论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此次结集出版的《统一战线发展进程中的探索与思考》《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西柏坡多党合作文化论纲》《理论·制度·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五一口号”史稿》等“河北统战‘理论园’”丛书，就是这些成果中的精华，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梳理总结，通过对统一战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探讨，推动新形势下河北统战工作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部署，特别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实施，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高度，掀开了统一战线创新发展新的一页，迎来了统战事业蓬勃发展新的春天。河北统一战线将以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为动力，继续深入研究党的统战理论和方针政策，挖掘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破解制约统战工作的难点问题，以统战理论和实践创新带动、活跃河北统战事业发展全局，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河北统一战线应有的贡献。

范照兵

2015年7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1)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中国化问题	(1)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知的演变和发展	(8)
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5)
多党合作视野下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48)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逻辑支撑	(64)
第二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方法论研究	(72)
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逻辑支点、辩证关系 和实践路径	(72)
西方政党利益整合机制对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方法论 启示	(82)
第三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体系研究	(90)
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	(90)
中国政党制度核心价值观及实践路径	(9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	(113)
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问题	(120)
第四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关系问题研究	(126)
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126)
中国政党制度与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133)
和谐中国政党关系的实践路径	(142)

第五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问题研究	(152)
参政党参政能力提高的维度问题	(152)
依法治国与民主监督的关系	(158)
党外人士进入国家政权的依据	(173)
党外代表人士政治素质构成的主要素	(190)
从代表人士成长为旗帜性人物的三要素	(198)

第一部分 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中国化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第21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历经了多个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的经典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中国化，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了制度创造和政治实践，多党合作成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中发挥了独特的宝典作用。

一、经典：多党合作思想的阐释

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无产阶级政党摆脱孤军奋战、团结同盟军，凝聚力量，获取无产阶级胜利的力量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领导者的历史使命，就不能够孤立地奋斗，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不仅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要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更要“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究其原因，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没有强大的力量聚集和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只有联合与团结，才有可能胜利。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①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胜利”。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胜利，不仅要联合和支持农民，而且必须联合和支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要联合和支持一切民主政党，组织起广泛的合作，力量达到足够强大时，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确定的战略目标。

合作是必需的，但合作的对象是否需要选择和甄别呢？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标准：“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要敢于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可以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不是无原则的，要讲原则。以某种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为基础就是合作的原则，放弃这个原则，既没有合作的可能，也没有合作的必要。这是因为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多党合作策略原则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思维、理论是为夺权服务的。对于这些策略，列宁多次强调这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②，之所以要同他们合作，都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但对于革命胜利以后，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政党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同其他党派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很少提及过，也都没有作出明确阐述。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对多党合作经典论述的丰富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阐明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和革命道路等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义关于多党合作的经典论述，进行了丰富、发展和创新。其突出表现在：一是把多党合作从力量凝聚的策略变为长远的政治战略。二是把多党合作从思想学说变为制度实践。

多党合作从策略到战略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中国共产党处在革命党时期，多党合作是策略，还是战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多党合作不仅是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更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有人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①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需不需要多党合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民主党派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不少人因此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基本结束，民主党派已经是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针对多党合作还要不要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② 强调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将多党合作提高到长期共存的战略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与战略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多党合作能否坚持下去？这时我国的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对于这种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态度是肯定的、合作的。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把多党合作的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多党合作不仅是一种理论论述，也成为一种制度实践。首先，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把多党合作的思想纳入到边区政府的框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中，组成三三制政府，对合作理论进行了初步制度实践。其次，对于未来的政府架构，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当中，直接把多党合作思想纳入未来政府运作架构当中，使其成为未来政权的一种制度设计。并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政府机构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以及由此选举产生的由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标志着多党合作思想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设计。第三，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多党合作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是第一次对我国的多党合作使用政治制度的概念。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是统战系统的第一部法规性文件，它重申了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以说，从学说到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经典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二、宝典：多党合作的独特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四种因素：独立的国家，有效的政府，合理的制度以及科学的发展。多党合作的作用正是从这几方面发挥了宝典作用。

（一）多党合作共同缔造了共和国

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挚友和诤友，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各民主党派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并利用各自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献计出力，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谋划新中国未来的筹备过程中，更是体现出众志成城、多党合作的结果。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的六个筹备小组中，其成员均由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成员联合组成，其任务主要完成：（1）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2）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3）起草共同纲领；（4）起草宣言；（5）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6）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可以说，这六个方面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多党合作、多党协商的结果，共产党与各党派以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政党特色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政权的有效运行

当代世界各国政党都是以政权为中心开展活动的。从发展中国家看，由于资源比较分散、社会组织自主性低下、传统臣民文化意识较强，国家政权通常被看作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政府只有是有效的政府，才能够推动政治发展。如果政府权威式微，无法履行政府应有的功能，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失序。政府要有效，就必须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资源汲取、秩序供给、政治整合和政治容纳功能。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资源比较分散、社会组织自主性低下、传统臣民文化意识较强等不利发展的因素。如何克服不利因素？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样就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民主党派纳入到政权运行的框架中，有效地推动了政权的运行。在政权运行中，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协商，与执政党共同参与治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体制下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和抵消的弊端，使我国政权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

（三）多党合作加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与其历史发展的走向密切相关，都有其历史决定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这一历史性选择，是中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的。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民主党派献策献力。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确立与发展成为多党合作团结奋斗的最高体现和共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顺逆维系着执政

党和参政党共同的荣辱得失。

（四）多党合作推进了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政治支持的力度和广度。多党合作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表明：它不仅有利于满足中国“追赶型”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政治需求，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而且有效地保证了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推进了社会的科学发展。

从政治建设角度看，多党合作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从经济建设角度看，各民主党派有其特定的代表性、广泛的社会联系、丰富的智力资源等独特的优势，可以为科学决策提供多角度的意见参考。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多党合作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从而保证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的稳定。

三、法典：多党合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

多党合作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规定。我国1954年宪法的序言中，对我国的政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一规定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政党制度，为多党合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奠定了基础。

制度化意识的提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多党合作的操作与运行有较大的随意性。伴随改革开放深入与发展，“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成为各政党的共识。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部国家的根本大法还第一次对多党合作实现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主要机构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做了明文规定。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

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第一次把多党合作作为一种制度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提出，从政治体制的高度规范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并把政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多党合作提供了政策上和宪法上的保障。

多党合作，特别是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什么渠道保障作用的发挥。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多党合作的《意见》，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渠道进行了制度设计。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把多党合作制度推上了更高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2007年国家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多党合作的功能与作用及其在我国政治框架中的地位。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总之，多党合作制度确立六十多年来，经过丰富、完善与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和成熟的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各地方文件、人民政协各级组织规章制度等“软法”为主体内容，强化了我国多党合作法治化建设的制度储备，也奠定了我国多党合作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可以说，多党合作正从经典、宝典，逐步走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法典。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知的演变和发展

习近平在第21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这表明对我国的政党制度的认识、对各民主党派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建党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主党派的认识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过程，从建党初期对当时民主派别的排斥、不信任，到逐渐相互协作、友好共事，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也反映了在寻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正值社会转型和党派活跃之时，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创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派关系问题。当时的客观实际也要求中共必须对民主派别有一个明确的认识。1921年7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大”会议旗帜鲜明地亮明了对民主派别的观点，这次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①在同时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还进一步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就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这反映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就力图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性和纯洁性的愿望，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问题上缺乏一定的认识 and 了解，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还不能灵活运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召开的“二大”会议上，虽然对党派的认识有所改变，并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口号，表现出“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甚至与基督教合作”^①的姿态，但是，这种联合与合作不仅没有具体的行动，也没有寻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方式。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这种联合的愿望化为泡影。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在《政治议决案》中进一步否定了民主派别，认为，“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形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②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派别持这样的态度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共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对中国国情的错误估计，“打倒一切”和自我孤立的关门主义立场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党派，不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势力，以致脱离了联系人，孤立了自己，伤害了朋友。正如周恩来后来指出的，当时我们对党派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派别的关系。斯大林认为，在革命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不使这些政党陷入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当指向使这些政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联系人离开他们。不跟共产党走就是革命的敌人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必然导致认为民主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进而采取排斥打击民主派别的错误政策。从客观方面看，这也与中间党派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